

一家饭店吃了30年,还想吃,应该是真好。

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如此,女儿从美国回到南京,刚下高铁第一站去的就是大牌档。那是乡愁,那是记忆,那是时间。她担心家乡的味道变了,可南京大牌档依然如故,她觉得故乡真亲,故乡的美食真好。

据说开饭店有个七年理论,一家饭店如果坚持了七年,基本不会垮了。就像婚姻也有个七年之说,一个家庭经过七年的风雨基本不会散了。

开饭店其实也是饭店与顾客磨合的过程,而南京大牌档我居然吃了30年之久,从南京吃到

北京。我早就想写写它,但担心有做广告嫌疑,要申明,我就是一名普通顾客,没有任何的特别之处。

时间是1995年,那时我们喜欢在苏童的那个小阁楼上搓搓麻将,牌局完了就去周围找家饭店吃晚饭,但很少愿意再去吃。那天中午,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制片人闫寻找我们做一个《牡丹》的节目,录完片子,想找一家饭店用餐,出门发现,对面新开了一家店。起初我们以为



我很羡慕有书房的藏书朋友。“高斋晓开卷,独共圣人语”是我的梦境。我曾问一位作家老朋友:“你有书房吗?”出乎意料

的回答是:“没有,但我家里有书的‘房’”,我疑惑地问他:“书房与书的‘房’有区别吗?”他答:“区别在于集中与分散。”睿智的回答即刻让我释然,不必苛求专门的书房,购买看完收藏的书只要有它安身的地方就是它们的“房”。

我出生于毗邻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式书库门,居住面积33平方米的三间后厢房里,有我单独的一个三尺小床,“文革”前,家里订了《小朋友》《儿童时代》等杂志,床头、枕下、床下的纸箱就是它们的“房”。

1971年2月上中学后,开始用零用钱购买自己心仪的书,慢慢地积攒了有百余本书,于是在床脚处的墙上打入两根桩,搁上一块长约80厘米,宽约25厘米的木板,成了这栋书的“房”。随着书的增加,书的“房”从一层增加到三层。

1975年参加工作了,有点财务自由

是写错了,大排档为什么要写作大牌档?后来发现是故意为之,大牌的档和大的排档应该是有区别的。都说新开的饭店总是会讲究几天的,我们就去尝鲜了。没想到,“一见钟情”,一连去吃了几天。

大牌档最早设在洪武北路的一家仓库里,这家仓库先后做过服装店、鞋店,还做过化妆品批发,但生意都没有持久下去。这一天,原来“鞋宫”的牌子突然换成了“南京大牌档”,自此生意火爆。

那时候还没流行“沉浸式”消费,而这里率先尝试,未进门,先闻声。穿长衫的堂倌立在门外,见客来,便拖长了调子吆喝一声:“二位——里——面——清——哟!”这声调不像喊,倒像唱,带着些江南的糯,又掺了点江北的爽利,尾音悠悠地往上扬,像把钩子,轻轻巧巧就把人勾进了另一个年月。店里是另一番天地。

榹联灯幌,一色的昏黄;灰砖木窗,沉淀着旧影。八仙桌、长条凳,挤挤挨挨,人声嘈嘈,却不觉烦嚣。顶上悬着好些黄澄澄的灯笼,光晕暖暖地洒下来,笼着桌上的杯盘碗盏,也笼着食客们油光光的笑脸。墙角倚着块匾额,据说是从民间淘换来的老物件,木纹里都藏着故事。

书的“房”

仇志强

灰是常有的事。1984年结婚时,在凭票供应的全套家具中,又定制了一个大书橱和书桌。从此,上面四块玻璃门下面两层木质门的书橱大大改善了书的居住环境,也成了书的“新房”。以后每搬一次家,书的“房”都是装修中的重中之重。

我现在的住房不大,但三房一厅,每处都有书的安身之处。随着书的逐步增加,它们居住的“房”有点拥挤。2012年,我在原来的封闭式大阳台的一端做了一个高1.5米,宽1.05米的五层书橱,每层高30厘米,深度53厘米,前后可以放三排书。这个书的“房”虽然拥挤一点,但书橱门一关,风尘日晒全部拒之门外了。

我的收藏书不多,近万册而已,我虽然没有书房,但每间屋里都有书的“房”。

出院的时候,再把它们搁在书柜里,想起从前的日子,不禁感慨一番。这是送这特殊礼物的初衷。

亲戚出院,整理东西,脸盆、水杯,什么也没有少,就是少了这个小玩具。不管是被有意拿走还是无意丢失,也许,它是去继续陪伴需要它的人了。

我买了一模一样的那款向阳兔,重新置于我的床头柜。

“波斯猫家族”,在大悦城逛时,被不同的两款吸引。白色与灰色的植绒猫头与猫手是相同的。不同的是所穿的衣服,四个一套的系列,一个是红色黄色的暖色调,一个是蓝色绿色的冷色调,奢侈一下,全买

哲学,爱讲道理。瑞典26岁小伙杜普兰蒂斯,一点不讲道理,干净利落地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创下6米30的新世界纪录。

撑杆跳高,是一个横向速度通过撑杆支点阻力的反作用弹力,能量转换为纵向撑高的复合运动。速度不快,杆头不起;臂力不足、倒立无能——速度、力量、脑力、身技,缺一不可。最精彩销魂的是上升期——华丽转身、倒立悬空;果断放手、腾空鱼跃——一气呵成,妙不可言。

于是,“一厘米哲学”,应“撑”而生。想当年,布勃卡撑了17次的一厘米。而今,杜普兰蒂斯已撑了14次。不多不少、不增不减,每逢大赛,仅一厘米。有人戏说,这是“一厘米经济学”,每撑高一厘米,可得几十万美金。厘米就是“米”(钱)。有人解释是“一厘米心理学”,虽高杆仰止,但只要树立信心、没有不可逾越的。自信第一,看谁会“撑”。

“一厘米哲学”,说白了,就是

偶一抬头,还能瞧见戏台上坐着一男一女,抱着三弦琵琶,咿咿呀呀地唱着评弹,那吴侬软语,像给这满堂的热气罩上了一层纱,一般人也听不真切,反倒添了几分恍惚。

环境和氛围都是外在的,关键还是菜品。古法糖芋苗,暗红的汤羹浓稠得像玛瑙,里头卧着煮得酥烂的芋苗,勺尖一碰,便颤巍巍的。桂花糖的香是先钻进鼻子里的,一口下去,甜得正正好,是那种老南京秋天街头,小伢子们攥着零钱眼巴巴盼着的滋味。跑堂的说,这芋苗非

了,第二年,我就购买了当时最流行的五层斑竹书架,后来又买了一个。但这个书的“房”对书来说,居住环境不太好,沾灰是常有的事。1984年结婚时,在凭票供应的全套家具中,又定制了一个大书橱和书桌。从此,上面四块玻璃门下面两层木质门的书橱大大改善了书的居住环境,也成了书的“新房”。以后每搬一次家,书的“房”都是装修中的重中之重。

我现在的住房不大,但三房一厅,每处都有书的安身之处。随着书的逐步增加,它们居住的“房”有点拥挤。2012年,我在原来的封闭式大阳台的一端做了一个高1.5米,宽1.05米的五层书橱,每层高30厘米,深度53厘米,前后可以放三排书。这个书的“房”虽然拥挤一点,但书橱门一关,风尘日晒全部拒之门外了。

我的收藏书不多,近万册而已,我虽然没有书房,但每间屋里都有书的“房”。

了一款自己玩,另一款日后送给喜欢的小朋友,想象她眼里闪耀的惊喜,自己也随之开心。

房间里,站在音响上的棕熊,半尺高,黑衣黑裤警察装,脖子上挂一块“特警000110”的牌子,帽子也是一顶警察帽子。它的貌似威严,是双倍的萌翻了。朋友送的爱心礼物,擦灰,每一次都小心翼翼。

熨斗基本不用。放熨斗的小架子可以折叠,干脆从烫衣板上取下来,做成了一个小床铺。一个有被子盖的小娃娃就睡在上面。台灯下,你看书,她



南有嘉木
(篆刻) 秦国强

得用特制的桂花糖浆慢熬,火候到了,才有这股色泽光亮、酥软甜腻的意境。

天王烤鸭包则是南北混搭。这小笼汤包,皮子极薄,能瞧见里头晃荡的汤汁,真如梁实秋在《汤包》里写的一样,“抓住包子的褶皱猛然提起,包子皮骤然下坠”。可内馅儿却不是寻常的猪肉,竟是烤鸭肉。一口咬开,鸭油的荤香混着鲜甜的卤汁涌入口中,是烤鸭的香,又是汤包的鲜,两下里一撞,撞出个新巧别致,难怪能登上“中华名小吃”的榜单。

硕大的清蒸狮子头安安穩穩地坐在清汤里,旁边衬着几叶青菜,模样素净。用勺子轻轻一碰,那肉团便“颤颤巍巍,吹弹可破”似的。送入嘴里,当真就化开了,肥而不腻,鲜味是文火慢炖了六个时辰才浸透进去的,是份不急不躁的厚道。

我们和各路的朋友连吃了几天,过了一周,闫导又打电话给我和苏童,说

听你翻书的声音。她双目紧闭,嘴角含笑,仿佛与你一同感受书中的美好。有一次,小娃娃连着铺盖一同失踪。蓝色小格子图案的“熨斗床”光溜溜的,好生寂寞。直到第三天,小娃娃才在楼下的角落里找到。又在几天后的一幕真实场景中,偷破了案子:是家里的白猫,跳上柜子,嘴衔

娃娃,悄悄从楼上蹿到楼下。那一刻,它是它的好玩具。

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,在市中心一家电影院的卖品部,看了几个植物娃娃。一颗颗闪亮的彩色圆形塑料,南瓜、甜椒、李子、草莓……黄头发紫头发的小人儿的脸嵌在果实中,或眨眼调皮,或做惊讶状。为漂亮的颜色与有趣的造型吸

引,本来只想买几个,看到剩着的那几个似乎孤零零的,便全买下来了。一共八枚,用长方形的透明塑料盒子装起,放在五斗橱上。

二次元是如今的流行语。那些小玩意儿都是二次元。所有的玩具也都是二次元。我们自己也是二次元,可能也是二次元了。二次元与二次元合得来。或者,与玩具二次元的结合,能使人类三次元变成二次元。二次元与二次元心意相通,彼此抚慰。你相信吗?你每天注视它们,会发现它们是有生命的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流行,一个兔儿爷玩具也值得一直珍藏。

身、全力撑起,再果断放手、腾空越杆——全身而退、完美人生!

撑杆跳高,撑杆是手段、跳高是目的。难度最大也最值得玩味的,就是上升期——头朝下脚朝上的华丽转身。人生,何尝不是如此。只是退休后,还想借着权倾一时的力道再三拿起“撑杆”找支点、伺机反弹攀高,大概率是四脚朝天摔倒,自惭形秽。

“一厘米哲学”

吴四海

记得三年前,偶尔在电视上看到杜普兰蒂斯跳过6米20,有感而发写过一篇《撑杆跳高与人生感悟》。把撑杆比作事业,要高高举超,负重飞奔。再找准支点,利用反弹作用力,安身立命。然后,头朝下(谦虚做人)脚朝上(勤快做事),此时切不可昂首抬头,否则必倒无疑。最后,上升期完成转

夜晩归家,见母亲满面生光,话音里都带着雀跃:“今朝同玥碰头了。”玥姨是母亲大学同学,更是她半生知己,长居温哥华。“你猜玥送我什么?”她忽然问,眼中泪光闪闪。素来冷静的理工女这般情状,让我一怔。玥姨出国早,我高三时曾收到过她捎回的一套情碧,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着实稀罕。后来年年送礼,却再难有当初的震撼。

母亲见我半晌没有反应,迫不及待地拿出了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纸卷,说:“这是你爷爷的一张小画,我挺喜欢的,玥出国时我送给了她。没想到这次,她竟然还还给了我。现在的世道竟然还有这样的人!玥讲,‘这画本就是你们家

的念想,该叶落归根了。谢谢你四十年前把家中宝物送我。我拥有它,欣赏它四十年,已经很满足了。”

说起她们二人的情谊,须将时光倒回一甲子之前。1963年,她们一同考入上海科技大学化学系,大学最美的光景,她俩一起度过,功课做完,便去嘉定老街上闲逛,像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里那般无忧无虑。吃八分钱一碗的鲜肉小馄饨,再慢慢悠悠踱回宿舍。

然而她们迎面撞上了那个特殊的十年。68届大学生虽未上山下乡,却也未

“变味”,有原材料的问题,还有水的问题,还有水土不服的问题(很多在原产地很受欢迎的美食换了地方,当地人不一定接受),但这家居然完美地再现了当年的美味,我感动得不知怎么表达,就不断请朋友吃,向朋友推荐。现在北京有了十余家连锁店,遍布东南西北。这当然不

请我们吃南京大牌档。原来他回去和新婚妻子讲了,妻子就把新婚旅行地点定在南京,而且,第一顿就在大牌档。

到了北京之后,一直想念它家的味道,没想到多年之后,大约是2015年,大牌档在工体三三开了一家。我一开始有些怀疑,很多美食换了地方会

珍惜。退休后,最容易失去但最值得拥有的,不是别的,是肌肉。一过六十岁,流失加快。人生最后一咬,全因大腿肌肉无力,跌进黄泉。此时,金钱地位声望名誉,在肌肉面前,一文不值。

言归正传,与其往银行里存一厘米厚的纸币,不如往双腿上存一厘米厚的肌肉。大腿无力却腰缠万贯,带不来下半生的幸福,反而引起子女为遗产争得头破血流。有出息的,不在乎你的那点钱;没出息的,天天盼着你的“那一天”。只要肌肉在,就算五脏六腑需动手术,尚可走出病房。但即便明眸皓齿沉鱼落雁,肌肉没了——对不起,只剩卧床不起,坐等送终。

如此看来,撑杆跳高与退休感悟,别无两样,不就是一字——“撑”么!要不,你也来撑一撑?比如俯卧撑、大腿深蹲。不求多,每天撑一撑蹲一蹲。一年下来,你会发现,所谓“一厘米哲学”,即无哲理可言,也无真理可求。所有答案,全在自身!

钱晨

一件漂洋过海又被送回的礼物

分配到多少专业课。慢慢地,她们也琢磨出自己的法子,常相约以“看大字报”为名,几乎逛遍了上海所有公园。在人心易受污染、美好渐趋模糊的年月里,两个向内求真的女子,就这样结下了深厚的“革命友谊”。

分配工作后,她们仍被卷入那场“锻造新一代”的运动,分赴外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了一年半。有同学说母亲和玥姨是“物以类聚”,玥姨也曾对母亲说:“你无论何时何地都感觉投机,确实是真同类。我一直佩服你——我只知道看小说,你却涉及评弹、音乐、宗教、伦理,又精通日常大小事务,是个人才。记得在学校读你藏的《收获》,后来复刊了,我也学你一直收集,直到出国。”

40多年前,母亲把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礼物——我的爷爷钱瘦铁画的一幅《江上渔者》送给了最好的朋友永远留念。40年后,这幅画漂洋过海,重回上海故人手中。

“天之涯,地之角,知交半零落。”但真正的友谊不计较距离与时间。这些年来,她们相隔半个地球,却始终是彼此最能敞开心扉的人。在我眼中,她们依然是那两个手拉手逛公园的女生,从未走远。

是我推荐的功劳,而是它自身菜品受到了顾客的喜爱。美食的产生,是老百姓用嘴巴投票的结果。

有一次我请时任《花城》主编的朱燕玲在北京吃南京大牌档,吃完,她激动地说,要是广州也有就好了。过了不久,她告诉我,广州也开了。语气很兴奋,很自豪。这位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广州的南京姑娘,能随时随地吃到家乡的美食,不仅解乡愁,也为家乡的美食能在最能吃最会吃的广州站稳脚跟而自豪。

有趣的是,当年在洪武北路当领班的小姑娘孟凡,闫导私下悄悄称她是江南版的巩俐。20年之后,我们居然在北京的店相遇了。她一眼就认出了我,王老师没变啊。我也一眼认出孟凡,虽然小姑娘变成了总经理,但气质和模样没有变。故人相见,甚是欣喜。可孟凡告诉我,北京这边开成功了,她很快就要离开了。过几天她要出国了,要陪孩子去加拿大念书了。

大洋彼岸有大牌档吗?也许有,也许没有。

十日谈

玩具总动员
责编:郭影